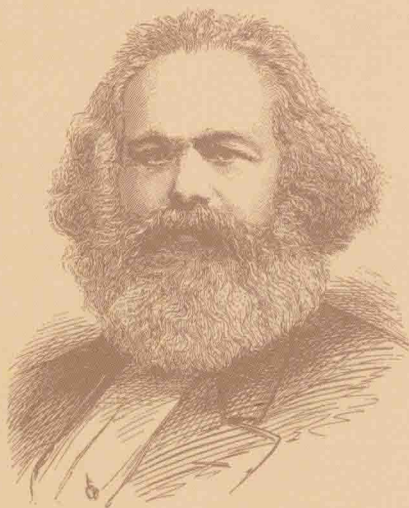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系列

现代性语境下的 中国价值观建设

徐 蓉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系列

现代性语境下的 中国价值观建设

徐 蓉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语境下的中国价值观建设/徐蓉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12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系列)
ISBN 978-7-309-11113-2

I. 现… II. 徐… III. 社会主义建设-价值论-研究-中国 IV. 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5827 号



现代性语境下的中国价值观建设

徐 蓉 著

责任编辑/陈 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22 千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113-2/D·715

定价: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委托课题（2012WKS001）最终成果：现代性语境下的中国社会价值观建设
上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徐蓉工作室2014年度成果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科建设研究项目资助出版

丛 书 序

自 2006 年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学科建设就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旋律。近几年,从客观要求出发,我们把学科发展的主要工作放在布点建设上,主要体现为学科点规模的扩大。但是,学科的发展不能仅仅是学科点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学科建设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因此,在学科点建立以后,就必须集中力量注重学科的内涵建设。

学科建设的内容有很多方面,但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是学科发展的理论研究。作为学科建设的基础内容,理论研究体现了学科建设的水平和成果。离开了理论研究来谈学科建设,容易把学科建设抽象化,或者把学科建设变为难以把握的东西。理论研究是实实在在的,可以把握的,并且能展现为具体的研究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的理论研究,重点应放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点来确定研究范围,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主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然应该名副其实,而不应该只有其名而无其实。我们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明确界定,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所属的各二级学科的范围,或者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不是泛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等诸学科的理论研究。因此,也就不能因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和建设的范围,否则,就可能既模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也未必有利于其他学科的建设。

二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坚持与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只有体现这个品质,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在理论研究中要把握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无从说起,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有新的方法、新的内

容,不能只是重复过去已经讲过的老话,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没有反映实践发展的理论研究,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容易,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更不容易,做到二者的统一,才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这套“复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系列”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科建设研究项目”的成果,本丛书突出研究的理论性、学术性、创新性,力求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成果。论丛的作者以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团队为主体,以及集聚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这一平台上的理论研究队伍。我们力争用几年时间,经过努力,集中展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作出贡献。

顾钰民

2014年9月

目 录

导论	1
一、当前我国价值观建设问题的实质与研究的缘起	1
1. 社会形态与价值观的属性问题	2
2. 社会转型与价值观的变迁	4
3. 现代性与价值观的复杂性	7
4. 价值观与具体行动之间的张力	11
二、价值观研究的一般路径与方法	14
1. 面向生活和现实的实证研究	14
2. 追寻发展进程的历史研究	16
3. 深挖思想根源的理论研究	18
4. 中西方之间的比较研究	20
第一章 关于价值观发生机理的探讨	23
一、价值观发生的逻辑前提	23
1. 主体及其活动	23
2. 主体所处的环境	25
3. 主体的问题遭遇	27
4. 主体活动所受到的约束	29
5. 主体活动的结果	30
二、价值观发生的一般过程	32
1. 主体的生活体验	33
2. 主体对生活主题的提取	36
3. 主体对意义的关注	39
4. 主体的价值建构	42

5. 主体的集合与抽象	45
三、价值观的社会功能与价值观建设的现实意义	49
1. 价值观的规范与调整功能	49
2. 价值观的统摄与导向功能	52
3. 价值观的激发与促动功能	55
第二章 价值观的形态	58
一、价值观的基本形态	58
1. 价值观的理论形态	58
2. 价值观的实践形态	63
3. 动力机制与价值观的形态	68
4. 社会关系与价值观的形态	73
二、价值观的特殊形态	76
1. 代价观的缘起	77
2. 代价观的本质	80
3. 代价与代价观的表现	83
三、价值观的存在基础与价值观建设的机制	87
1. 价值观形成的思维基础	87
2. 价值观形成的现实基础	90
3. 价值观建设的机制	94
第三章 面向现代性的价值观建设	98
一、价值观建设的取向、条件与限度	98
1. 价值观建设的取向	98
2. 价值观建设的条件	101
3. 价值观建设的限度	104
二、关于现代性内涵的梳理	106
1. 现代性话题的缘起	106
2. 现代性的基本内涵	109
3. 在现代性语境下认识当代中国	112
三、现代性问题与现代性视野	116
1. 对现代性问题定位	117

2. 现代性的普遍与多元之争	120
3. 在现代性下寻求平衡	123
四、现代性与传统性、民族性的关系	125
1. 尝试与对话	126
2. 转型与超越	128
 第四章 转型中国的价值观建设	132
一、社会转型与国家价值观构建	132
1.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特点	133
2. 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与建构国家价值观的必要性	137
二、国家价值观的基本构成	141
1. 国家的利益观	141
2. 国家的责任观	146
三、现代化进程与中国国家价值观的内向建设	150
1. 以中国特色为根基	151
2. 以科学发展为路径	153
3. 以社会和谐为归宿	156
四、全球化进程与中国国家价值观的外向表达	158
1. 平等互信	159
2. 包容互鉴	161
3. 合作共赢	163
 第五章 社会转型与个体价值观建设	167
一、个体价值观形成的社会基础	167
1. 改革与发展的承接期	168
2. 矛盾与问题的多发期	170
3. 现实选择的多样性	173
二、现代性的社会制度与心灵秩序	175
1. 制度与心灵的关系	176
2. 制度的变革与心灵的变迁	179
三、社会约束的范式与个体价值理念的生成	183
1. 道德的约束	184

2. 法律的约束	187
四、从个人美德到公共精神	190
1. 个人美德的养成	190
2. 公共精神的培育	193
 第六章 走向和谐的价值观建设	197
一、直面价值困惑	197
1. 价值目标的困惑	197
2. 价值原则的困惑	199
3. 价值判断的困惑	201
4. 价值选择的困惑	202
二、对传统性与民族性的超越	204
1. 中国问题的特殊性	204
2. 对传统性、民族性的超越	208
三、走向和谐与价值观建设的多重维度	211
1. 民族精神与国家精神相结合的维度	211
2. 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相互映照的维度	213
3. 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的维度	216
 后记	220

导 论

价值观的形成和建设始终伴随着个体、社会、国家的成长与发展之进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价值观的认识、价值观表达的内容与形式、价值观的形态与类型等都会有所不同,价值观及其建设是一个时代性极强的话题,不仅同一时代背景下存在多种类型的价值观,而且不同类型的价值观对于时代的发展具有性质截然不同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都开展过价值观建设,也起到过特定的作用,但时代的发展总会出现类似尼采所提到的“重估一切价值”的需要,尤其是在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的今天,社会的转型已使价值观的冲突与变革成为一种时代性的思想文化现象。价值观的建设关系到个体、社会、国家将以怎样的姿态面对现实并展望未来,关系到个体、社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质量和动力,已经成为一项重大的现实课题与历史任务。

然而,与这一历史性任务同时存在的则是当前我国价值观领域的诸多矛盾和困境,这些矛盾和困境有些是源于物质生活领域的现实与问题,有些则源于思想观念上的认识误区,这些问题也表明当前我们在价值观建设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与滞后性,一些问题未能得到深入的阐释、解读和剖析,比如,如何认识传统价值观及其在当前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正确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判断存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之中的形形色色价值观,如何正确看待现代性问题及其在价值观领域的影响,如何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价值观格局,等等。直面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全方位地审视个体、社会和国家价值观建设的基本内涵、方向与进程。

一、当前我国价值观建设问题的实质与研究的缘起

建立在物质世界的建设基础之上,中国社会一直重视精神和思想领域的

价值观建设,并通常通过提出对个体价值观建设的要求来体现国家的价值倾向,同时也由此而期待个体的价值观、社会的价值观能与国家的价值观在性质、方向、内容等方面相契合。因为无论是从事物的结构功能与属性的角度、从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角度或者是从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来考察,价值观建设中都蕴含着合理性与合法化的问题,就国家价值观建设而言,其直接相关的问题便是政府的合理性与执政的合法化问题,即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及其导向是对民众意愿和需求的体现,政府能够得到民众的信任与支持。

纵观已有的价值观问题研究,从国家价值观建设的基本面而言,生存发展价值观和秩序价值观是两大备受关注的问题,这两类价值观普遍存在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生态等领域之中,并维持国内社会(乃至影响国际社会)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系统的运转。一般来说,价值观不仅是一个思想系统,而且还是一个实践系统,它不仅关系到人们以创造怎样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来满足自身与社会的需要,而且关系到人们以怎样的方式来创造这些产品。国家的价值观则是政府代表国家进行决策和采取行动的理念,生存发展观和秩序观是国家决策与行动系统中最基本的价值理念所在,我国价值观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在这两方面都有具体的表现。

1. 社会形态与价值观的属性问题

社会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用来分析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范畴,是一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下的产物,通常由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组成。社会形态所揭示的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生活所具有的整体性特征,根据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形态进行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划分,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是生产关系的性质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阶段性体现,同时也在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在探讨价值观建设的过程中,属性问题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就当代中国而言,无论是国家的建立、建设还是发展的进程,都决定了社会主义对于中国而言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社会主义性质,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特性,都需要在价值观的表达和建设中得到体现,也即,当代中国在个体、社会和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建设都需要思考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特性的问题。

那么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价值观究竟有哪些具体表现?或者说应该在生产和生活的哪些领域得到体现?如何体现?这个问题既需要着眼于当下,

也需要回应历史。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入侵、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薄弱、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高涨的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一实践的进程与经典理论对社会主义的描述和展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一方面,她类似于考茨基眼里的“早产儿”,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另一方面,她毕竟已经诞生,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体。社会主义这个本该以经济社会的高度发达为物质前提的社会形态,较早地出现在了包括苏联、中国在内的落后的东方国家,这些国家普遍具有较高的迎接社会主义的热情,但也普遍尚未具备走上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这些国家在建立和建设现实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所需要跨越的“卡夫丁峡谷”,还可能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然而,不管怎样,在这些革命成功后的国家,从开始宣布采用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之日起,其骨子和血液里涌动着的便都是对经典理论所描述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追求,或者说在其对于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中,都力图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具体而言,这些价值观在国家层面主要包括公有制、计划经济、消灭贫穷、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文化革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等等;在个体与社会层面则体现为个体服从于群体、集体,整体的集体主义,不计个体利益的自我牺牲和大公无私,等等。这些价值观中所包含的鲜明的社会形态烙印一度被认为是从资本主义的经验与教训之中提炼而来的,它们既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点。

而从中国的实践来看,现实的社会主义除了对这些主要价值观的追求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历代领导集体在实践中的大胆探索,以及在探索过程中对原有条框的不断突破,比如:在所有制形式上的突破,探索和实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经济运行模式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断推进各个领域的制度创新等,这些突破和探索在中国社会掀起了广泛的效应,一方面激发了旧体制下未曾有过的强大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困惑和问题,这些困惑和问题中有一些是属于价值观层面的。而在个体和社会层面,也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格局的调整而出现了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个性出现张扬、在各种利益关系面前变得工于算计、责任感模糊甚至缺失、奉献意识淡化,等等,这些都是价值观变迁的真实写照。

当然,上述文字对于发生在中国的国家、社会和个体等不同层面的价值

观变化的描述实际上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尚缺乏一个量的统计并由此确切地获知价值观变化的轨迹,而且迄今为止我们也很难对价值观变化的内在机理得出确切的结论,这种变化究竟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抑或是两个方向同时进行?而历史却也无情地给予了我们一些教训,那就是,价值观在其属性上的变化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将是颠覆性的,苏联的灭亡便是重要的佐证。笔者并非想把苏联灭亡的所有责任都推向戈尔巴乔夫,但是在他的“改革与新思维”倡导下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化,政治上主张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议会民主和多党制,在文化上鼓吹公开性、多元化和“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张多元竞争,等等,这些观念中所蕴含的非社会主义的价值属性毕竟还是构成了社会主义苏联走向终结的重要环节。由此也带来了我们所需要审慎思考的问题,以维护现有的社会形态为出发点,国家、社会、个体的价值观该维持怎样的属性?时代的发展变化通常会成为促使价值观变化的动力,而这种变化是否有章可循?或者说,应该遵循怎样的变化尺度才是合适的?究竟哪些可以变化或需要变化,哪些又是我们不可放弃的原则?

2. 社会转型与价值观的变迁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社会一直处于不断的社会转型进程之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后,社会转型不仅速度加快,而且在更多方面、更深程度上影响政治与社会生活的进程,使包括社会结构在内的我国社会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深刻变化,传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制度体制在新的形势下面临诸多挑战,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应对新的变局下呈现出诸多变迁和新的特征。不仅“意识上的变革——价值观和道德伦理上的变革——会推动人们去改变他们的社会安排和体制”^①,而且体制和制度的变革也会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社会的转型并非一个自然行进的过程,而是更多地与观念的力量、制度的力量联系在一起,与来自外部世界各种物质的、思想文化的冲击联系在一起。社会转型通常都是在开展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出现,具体而言,与社会事业建设、社会制度建设、体制机制建设、社会结构建设、社会管理等事务

^①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27页。

的进展密切相关。我国的社会建设是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同步推进的,陈剑先生提出了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社会建设在四个方面的目标和追求,分别是:其一,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形成合理的医疗、住房、教育、就业保障制度;其二,构建合理的社会结构,使社会各阶层之间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形成一个中产阶层队伍不断壮大的社会,构建起“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其三,培育各类社会组织,使之能弥补市场运行和政府运作中的一些不足,不断增强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其四,建立和完善法治社会的利益表达机制,使不同社会群体的多元利益与诉求能够拥有畅通的表达渠道和良好的实现方式^①。

可以说,我国的社会转型就是伴随着社会建设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建设进程的社会变革,具体地,就政治生活而言,正在逐步实现权力由集中到分散、治理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从经济生活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取代了单一计划的运行和自然经济的模式;在社会关系领域,人们对于平等、自由等的追求正越来越多地超越原有的依赖关系。按照社会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结构主义学者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观点,社会转型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对于我国社会来说,这一转变在特定历史时期所造成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使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生产和生活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也使得人们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迁。

由于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通常都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和支持,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遇到困难、挑战、风险都属正常现象。无论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合理社会结构的构建、各类社会组织的培育还是良好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确立,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政府恰当地定位自身的职能,相应地调整其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方式,向社会让渡必要的权力。但对于长期习惯全方位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政府来说,做出这一转变无疑需要一个过程;而对于缓慢发育成长的社会力量而言,发展出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则需要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并在参与过程中不断增强法治意识和法治水平,能够准确地运用法律来保障和实现自身的各项权利和利益。这一过程对于政府和社会而言都是一项重大的考验,而在应对考验的过程中,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通常又是走在最前列的。

^① 陈剑:《社会建设目标及相关措施探讨》,《中国发展观察》2012年第6期。

价值观,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于某一事物价值(包括其量值和意义)的总体看法和评价,通常由行动中的目标、取向以及评判中的标准和原则来体现^①。价值观是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导向作用的特定信念系统,提倡或遵循什么、反对或摒弃什么,价值观在人们的行为选择中所起的是一种规范性的判断作用,因此,一定的价值观往往与一定的社会运行和社会生活模式相联,而当整个社会运行和社会生活模式发生变化时,人们的价值观也将发生联动性的变化,这也是当前我国社会价值观呈现多元,其变化频繁且剧烈的重要根源。可以说,社会转型所涉及的领域有多广,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和活动中对事物的判断、认识的变化就有多大,当前,几乎在衣食住行、为人处事的每一方面都面临价值上的新取舍。

当然,价值观的变迁多数时候并非是一种直接的宣誓,而是隐藏于人们行动的背后,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行为潮流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价值观的一种揭示。比如,随着改革开放的日渐深入,我国社会出现过多种行为潮流和热点,经商热、留学热、文凭热、跳槽热、股票热、房产热、信贷热、投资热、消费热、移民热、红歌热、创业热、反贪热,等等,几乎每隔一个时间段都会随着当时的社会形势而出现一些热点行为,这些热点和潮流既揭示了一段时期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同时也代表当时人们行为中的价值取向,一定程度地表明了人们的利益观、教育观、创业观、政治观、国家观等价值观念,而从价值倾向来看,这其中有积极的、消极的和中性的价值观之分。这些多元的行为热点趋向和价值表达,一方面表明人们的主体意识在不断增强,尤其是表现在选择或追随什么样的潮流问题上;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们之间价值观的相互影响、相互传递及其程度。

价值主体的主体意识不断凸显和增强,是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作为影响人们价值观的背景和物质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经济在客观上要求个体和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这极大地改变了计划时代个体和企业被客体化、整体化的状态;市场经济还充分肯定个体和企业对合理的物质利益的追求,使人们认识到追求利益的行为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因此,追求个体利益、自我独立、个性发展和自我实现开始成为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需要。人们开始远离依靠、远离等待、远离

^① 关于价值和价值观,笔者曾在《核心价值与国家形象建设》一书中进行过具体的探讨,详见徐蓉:《核心价值与国家形象建设》,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他人的干涉,积极地储备知识和技能以应对未来职业的挑战和竞争,人们也开始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更加注重自身在各方面能力的增强,更加注重就某一事物能否发表自身独立的见解。而在价值本位向主体倾斜的同时,人们的自我中心倾向也逐步显现,他们比以往更看重自我设计和个人奋斗,同时也更希望自由发展而不受外界约束,对外部社会的期望和要求过高,而对自身的从严要求不够,在处理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时,更容易把满足个人要求与实现个人理想放在较高的位置上,而不重视社会理想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在道德行为选择和利益取舍的场合,人们往往更注重物质利益而忽视远大理想,以物质化的原则处理日常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甚至出现为了物质利益而牺牲崇高理想、背离道德原则等的行为,社会生活中存在不少拿规则当游戏、视冒险为创新等的现象,过分把自身拥有的资源、技能看作在相互竞争中实现个人利益的手段和伎俩,而不是力求成为守规则、有尊严的道德主体,也常常以过分精明的利益算计抹杀了对高尚人生目标的追求,虽尚谈不上纯粹的金钱或物质至上,却也已沦为赤裸裸的实用主义,这些都是当前社会主体在价值认识层面发生的巨大变化。

当然,不同社会主体对社会转型的反应也存在差异,具有不同知识水平、个体修养、社会地位的主体,其价值观的表现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呈现分化性,这种分化性既表现为个体身上价值的多元取向,也表现为不同个体之间价值取向的差异,这种价值分化还深深地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

3. 现代性与价值观的复杂性

现代性是一个带有强烈时间标志的概念,它所表达的是特定历史时段下社会所处的状态,指向的是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因素的摒弃和非传统因素的累积,在社会学的意义上,现代性意味着新的社会组织机制、国家治理方式以及价值理念的出现。在西方社会,把现代性的缘起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发展密切相联,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秩序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征;在中国社会,自洋务运动以来,现代性特征一直处于不断生成之中,在经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价值观念不断受到触动,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则引发了价值观领域历史性的变革,人们的利益观、金钱观、人际观、时间观、效率观、风险观、权利义务观、民主法治观等都处于不断调整之中,脱离封闭和保守的传统、培育开拓和创新的能力已成为大多数个体的共识。